

春秋 战国的 时代的历史变迁

李瑞兰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5.07

小 序

追求发展进步是人类本质的一种体现。现实中的人为了增强这方面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往往面向历史寻求启迪。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变迁之剧烈、社会进步之显著，为古今所罕见，故对这一时期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之缘由、进程、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事。笔者尽管学识有限，但还是在这一领域作了些探索。于是，便有了这本小书。

社会变迁的原始动力固然是经济基础，但直接起作用的则常常是政治行为，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的国家，“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统治者也即社会管理者的活动。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中表现得极为鲜明。轰轰烈烈的春秋大国争霸和战国七雄的改革与争胜，至少都是在历史表层上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动因素，而人民则是在深层里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历史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

历史变迁无论怎样天翻地覆，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和人为能动作用的统一，是一种历史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统一。人们不可能割断历史求得发展，必然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或者说发展本身即包含着继承。而同时，发展又必须有创造，发展是对每一代人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大检阅。春秋战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霸者和劲雄，都是在继承中以创造求发展的典范，尤其是凭借改革后来居上的秦国，其崛起之快，成功之著，更为发人深省。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和财富，观念的变革既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又是历史变迁的一种动力。春秋战国时代，新观念新思潮层出不

穷,其综合成果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体系,不仅于当时而且在后代,都以其特有的能量在历史运动中打下了自己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是一幅内涵丰富蕴意深远的历史画卷,这本小书实难全面挖掘它的价值,如果立足于上述视角的一些论述和见地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也就足以自慰了。

李瑞兰 一九九四年二月

目 录

小 序.....	(1)
第一章 王权的涨落.....	(1)
第二章 霸权的兴起	(24)
第三章 大国争霸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40)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新观念、新思潮.....	(69)
第五章 “诸侯力政,争相并”的新形势.....	(92)
第六章 变法、改革——战国历史的主旋律	(110)
第七章 重塑华夏文明模式的划时代进步.....	(143)
第八章 百家争鸣与历史变迁.....	(167)

第一章 王权的涨落

一般来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然而,不应忽略的另一极是,耸立于一定生产和交换方式即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权力结构,一经形成,“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相对独立性,“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②诚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一文中所指出的:“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③上层建筑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正系权力结构,因此,我们在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有必要把目光首先凝聚在作为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社会变迁晴雨表的权力结构及其相关的政治运动的变化上。

先说春秋。

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进行概括的话,那就可以说,王权、霸权与卿权的交替演变,形成了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并且作出深刻表述的是伟大而睿智的思想家——孔子。他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

这位深邃睿智的老夫子认为，假若天下太平，那么制礼作乐、号令天下的征伐等事都要由周天子来决定；假若天下昏乱，那么礼乐征伐等事便由诸侯发布命令。诸侯决定礼乐征伐的时候，大概传到十代就很少能有继续下去的了；如果由大夫来决定礼乐征伐，那么就很少能传到五代；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则很少能传到三代。如果天下太平，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们的手里，这样的话，庶人就不会议论纷纷了。

孔子的这个说法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其间的道理就在于它抓住了自西周至春秋政治形势发展的基本特征。概括来说，西周时代周天子尚高居于政治的颠峰，那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春秋时期，列国诸侯先后登上政治舞台，霸主们纷纷亮相，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可以说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从春秋后期开始，卿大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渐至改变整个政治格局的地步，要是把他们以“陪臣”视之，那么，便可以说是“陪臣执国命”的时代了。

要想真正弄清楚西周春秋时期权力结构递变的来龙去脉，就得首先对我国上古社会王权形成及其初步发展的情况进行一些探讨。

按照有些古文字学家的考证，据说最初的“王”字是人们依据斧钺的形状描画而成的，它的意义是表示掌握斧钺者的征伐和杀戮的权力。考古发现为这种推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址里已经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石钺和玉钺，有些

^① 《论语·季氏》。

制作得还相当精细，以这样高级的钺为随葬品的墓主，往往是当时氏族和部落的首领，一般认为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王权的萌芽。王权的出现实为社会发展所必须，古人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吕氏春秋·恃君》篇说：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

这段论述对于君主产生的社会必要性，做了难能可贵的说明。它指出了君权的产生为人们“聚生群处”所必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十分崇敬英雄。据研究，夸父追日，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等反映人类征服自然坚强意志的传说与神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最初的王权观念也就蕴含于其中。

在文明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考古发现所见那个时代的器物图案里已经有了不少表现英雄——即王的权力的蕴意。当时的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所表现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温和的主题，而是以繁复的迴旋纹路突出神人或神兽的巨眼，在有的云雷纹中还有若隐若现的神面和双眼，犹如天神在变幻莫测的上苍俯视着人间，显得非常神秘。在良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玉器的纹饰里，常见有神人的形象，一般有倒梯形的脸面，重圈形的眼睛，鼻部的下面是布满相对利齿的阔嘴，神人的头上多戴有高耸而宽大的羽冠，就是在神人的腹部也有巨眼和獠牙的兽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神人的双手直指神兽的两眼，似乎只是轻轻一点，就已经将桀骜不驯的神兽制服。这个时期所多见的神人和神兽的形象毫无和善妩媚之态，但却

在狰狞与丑陋中显示出降龙服虎般的威力之美。这种形象固然不会使人感到可亲，然而却能使人敬畏，使人肃然。当时人们对于神人的尊崇，正是当时的现实中对于英雄颂扬与尊崇之情况的反映。作为英雄时代，王权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它的讴歌，乃是当时社会观念的主旋律。在原始民主平等的氛围里，已经超出平等范围的王权，正是那个时代社会进步的萌芽。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发展，尚需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得壮大。

当历史正要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能够作为时代潮流代表人物的是接替尧、舜成为中原炎、黄部落联盟首领的禹。禹的时期，社会正经历着由野蛮转向文明的巨大变革。关于这个巨大变革，古人曾经用“大同”和“小康”的对比进行说明，所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

所谓的“大同”时代的核心特征是原始的民主与平等，英雄观念与王的权力并不与乎其中。到了社会进入“小康”的时候，这种原始的民主与平等被破坏，人们权力和利益的相对平衡变成了不平衡。我国的古代社会正是在这种不平衡出现之际实现了新的飞跃。《礼记·礼运》是这样描绘“小康”之世的：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宋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

^① 《礼记·礼运》。

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小康”之世，“天下为公”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已经初步形成，高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是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为代表的一批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就是现实社会中最杰出的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叙述把禹作为小康之世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其用意颇为耐人寻味。可以说，禹乃是站在文明门槛上的一位伟人。一般认为，在禹之后，我国古代社会就由原始民主共同体跨进了王权高踞其上的政治国家脱颖而出的文明时代。

在我国文明的发轫时期——夏和商王朝，王权虽然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是夏、商时期的王，实际上还只是当时各个方国的最高酋长，夏、商之王的权力对于各个方国来说还相当有限。夏王出自姒姓族，夏朝时期有许多方国部落，见于《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就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褒氏、费氏、冥氏、斟戈氏等。《吕氏春秋·用民》篇说：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可见夏、商之际方国部落数量之多。古文献所载“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①亦是一个证明。据推测，夏朝时期大约有几千个方国部落同时存在，这是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中一个相当庞大的力量，对于新生的王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制约因素。

从阶级斗争的发生和初步发展的情况看，夏代的阶级斗争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家也只是一个雏形。夏朝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夏王朝与诸多的方国部落之间，而非夏部族内部的穷人和富人之间。我们的这一个估计，对于说明古代的王权的形成十分重要。列宁曾经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

① 《逸周书·股祝解》。

出来的。^①

借助于考古和文献资料，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条件和道路，比较独特。她既不象古希腊雅典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中产生，亦不似古罗马那样由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炸毁氏族制度而后出现，并且与德意志人通过大规模军事征服、吸取被征服者的文明成果使自身的氏族机构得到改造而形成国家的道路亦判然有别。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形成是黄、淮、长江三大流域的众多部族为争夺当时较为优越的生存空间——黄河流域，长期杀伐征战的结果。于是，在生产力尚处于使用木石器阶段（希腊、罗马、德意志人的国家皆出现于铁器时代），而且氏族内部民主制尚未发展到高级形态（希腊、罗马、德意志人国家形成前，氏族民主制皆已发展到军事首长，部落联盟长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三元”并存的水平，而古中国的氏族民主制在国家形成前只具备军事首长和部落联盟长会议“两元”。）的情况下，由于集体协作劳动已能创造出些微剩余劳动——即已构成了供他人占有劳动的起码的剥削条件，部落战争的目的便逐渐由消灭对手向征服对手演进，被征服者、战败者被迫向征服者、胜利者称臣、纳贡，成为被统治集团，而征服者、胜利者则在“恭行天罚”的神秘外衣掩护下，理所当然地称后，称王，成为攫取了由本氏族贵族世袭部落联盟长特权的统治集团。由此产生的统治权力，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专横、跋扈、以暴力作后盾进而化家为国、将氏族机关转变为暴力强制机器的特点。不消说，这是一种在生产力、私有制和阶级分化未得充分发展、血缘共同体仍顽固存在的条件下，借助于战争和暴力发育出来的一种早熟的国家权力。这种权力的代表，即是王权。如果要分阶段的话，可以将夏代称为王权的初生期，商代称为王权的发展期，西周则进入了王权——也即古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期。

关于商初王权的形象，《诗经》里有这样的说法：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页。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①

这是成汤的后世子孙对他的颂扬，说在灭夏的时候，成汤威风凛凛地站在大旗下，虔诚地拿着大钺，他所指挥的军队气势如同烈火般旺盛，恁谁也阻挡不了。这些诗句所塑造的成汤，已经不是夏代那种权力比较弱小的王的形象，而是能够对诸多诸侯——即方国部落首领下命令的君主。《尚书大传》说：

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继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

在《尚书大传》作者的心目中，成汤已经是名符其实的“王”了，所以在三千诸侯中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崇高威望。关于“王”与“后”的关系，有一条相当重要的材料可以加以说明：

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②

这个记载指出，在灭夏的那年三月间，作为“王”的成汤来到商都的东郊，在那里召集诸侯开会，并且发布训诰之辞。成汤诰诫各个方国部落的君主们，让他们注意，应该有功劳于民众，要勤奋地干好自己的事情。成汤还特别强调自己有处罚他们的权力，由于事先做了说明，所以方国部落的首领若受到处罚时就不要埋怨。在诰辞里，成汤还举出禹、皋陶和后稷这三位上古时代的“王”，让各个方国部落的首领以之为榜样。他指出禹和皋陶曾经长期在外操劳，为民众立有大功，所以民众才能得到安定的生活。他们治理了江、济、河、淮四条大河，民众才得以安居。后稷率领民众发展农业，播种百

① 《诗经·长发》。

② 《史记·殷本纪》引《汤诰》。

谷，也立下大功。成汤举出他们的例子，目的是要说明只有勤奋努力才能成为民众认可的君主。这是正面的例证。与此相对，成汤还举出了反面的例证，那就是蚩尤。蚩尤作乱，有不少罪状，所以上帝对他进行了处罚。从成汤对于方国部落首领的这段谆谆教诲的言辞里，我们可以发现成汤与方国部落首领在权力方面的差距。成汤讨伐夏桀以后召集诸方国部落的首领开会，载籍谓“告诸侯群后”，从中可见，“王”是居于“后”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君主。从成汤告诫群后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拥有居高临下处罚诸方国部落首领的一定权力。然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方面，那就是成汤所举的让方国部落首领仿效的人物，依然是上古时代处于初始阶段的“王”，禹、皋陶和后稷毕竟不是新的王权的代表。这种情况表明，成汤还是受到传统观念浓厚影响的。

在社会结构方面，商代最富于时代特色的是方国联盟的发展。当时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将矛盾百出的诸方国部落，组织为一个有一定秩序的整体。这种情况就要求商王朝由精明干练、富于经验的强有力的人物出任商王。许多历史事实表明，当这样的人物在位的时候，就会出现“诸侯毕服”的现象，反之，则会“诸侯莫朝”^①。文献和卜辞的记载表明，商王的继位，不仅有“父死子继”的情况，而且也有不少“兄终弟及”的现象。这其间的原因，很可能与加强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的需要有关。商代的王权尽管比夏代有了不少发展，但还远没有达到专制独裁的地步。至商末，商代王权方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商末的几位商王，其名号在干支字之前，往往冠以美称，如康丁、武乙、文丁等，这表示商王已经拥有了特殊尊贵的地位。商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竟将上帝的“帝”字用于自己的名号之后，称为帝乙、帝辛，这不仅是君权神授观念的反映，而且说明了当时王权的强化。

① 《史记·殷本纪》。

继夏、商两代而起的周王朝，社会文明程度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这种进步与国家机构的完善、阶级和社会等级关系的变化、氏族传统的逐渐削弱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与姒姓的夏族、子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周族的始祖弃相传是舜、禹时代的人物，曾经被舜任命为后稷，主持农事。周族在首领公刘时，居住于戎狄之间，公刘率周族迁徙到豳地。公刘以后九传到太王，周族又从豳地迁徙到周原。这以后，周族才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周文王的时期曾经吸引许多原服属商王的部落方国弃商投周，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①的兴盛局面，这也就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率众灭掉商朝，成为周王朝的开国之君。从周武王开始，西周王朝共历十二世、十三王。此外，在周武王以后，周公曾经摄政称王一个时期，在厉王末年有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共和”时期。周公摄政与共和行政是周代王权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

周王朝建立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审时度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改革，对于权力的分配、政权形式、结构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使得周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王权真正君临天下的政治格局。对于这一点，史学大师王国维曾经指出：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

① 《论语·泰伯》。

世帝王所能梦见也。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之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①

周王朝确实是一个“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时代。周初所实行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就是周代新制度和新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周代王权的得以加强，正是得力于这两项制度实施的结果。

周代的分封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呢？

在周武王灭商以后，曾经“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②。这类“褒封”的着眼点在于兴灭国、继绝世，与其说周武王此举是在实行分封制，毋宁说他只是在作出一种招徕天下诸侯的姿态。在戎马倥偬之中，周武王所注目的只是灭商的大业和政局的稳定，对于其所开创的新王朝的政治格局尚未来得及筹划，所以说他实际上并没有把有目的有规章的分封诸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周武王灭商之后夜不能寐的是“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夫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③，周武王当时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殷商的残余势力。他的那些“褒封”先圣后裔的做法，所走的仍然是商王朝的老路子。商代政体的主要特点是保持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使尽量多的方国、部落都聚集在商王朝的旗帜之下。周武王在克商后所进行的“褒封”，严格说起来，并不能算是周代所创立的具有崭新意义的分封制度。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逸周书·度邑》。

周代分封制的真正实施是在周公东征平叛以后。《尚书大传》有周公摄政以后“六年制礼作乐”的说法，分封制度或许就是周公所制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公之所以实行分封制，是跟他认真总结周初三监之乱的教训分不开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大夫富辰语谓“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即是周公推行分封制缘由的一个说明。周公、成王时期，分封制方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陆续进行，直到西周后期的厉、宣时期仍有分封。古代文献关于周代所封诸侯国的数目有不同的说法，或谓“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国余”，^①指在分封了四百多个诸侯国之外，还有八百多个服从于周的国家；或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②；又谓“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③，是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的数目在封国中占压倒多数。

那个时期，在中原和周边的广袤土地上，交错并列着数目相当可观的姬姓和其它族姓的诸侯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史伯曾经这样来概述东都成周附近的诸侯国情况：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④

这个说明对于我们了解周王朝的政治结构很有帮助。首先，西周的诸侯国已经不同于商代那种基本处于自然状态的方国部落联盟，因为它是以“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为主的，这些诸侯国都与周王朝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与亲戚关系，而在商代方国部落联盟里，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诸侯国，如果借用史伯的话来说，那就只是“蛮荆戎

① 《吕氏春秋·观世》。

② 《荀子·儒效》。

③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④ 《国语·郑语》。

狄之人”。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里，诸方国、部落虽然对于商王朝要以政治上的朝觐和经济上的贡纳表示服属，然而基本上却是独立的，它们对于商王朝并没有太多的依附，只是惧于商王的武力征讨才不得不拥戴其为天下共主。这些方国部落的向背常对于商王朝的发展有极大影响。故所谓的周文王时期“三分天下有其二”，并非周文王已经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而是指多数的诸侯国投向了周的阵营。周兴殷亡，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周武王在克商初期曾经试图兴灭继绝，走殷商的老路，靠天下诸侯的拥护来实现周王朝的巩固。然而周武王死后不久，三监和东方诸国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个事实表明，商代以来的联盟制已经不能适应周初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王权的巩固，周公制礼时，不再循规蹈矩，而是开创了分封诸侯的新局面。

史学大师王国维在论述周代分封制的历史作用时，曾经有如下一段著名论述：

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

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①

西周初期和中期，各个诸侯国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同姓诸侯国依赖于周王朝的卵翼而发展壮大，所以周天子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周天子已经不象商代的王那样，对于一般方国部落进行笼络，而是可以理所当然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了。周代的诸侯，固然在其国内是当然的君主，但是对于周王朝来说，还只能算是“王之荂臣”^②——即向周王尽忠之臣。从周代的礼仪制度看，诸侯必须对周天子俯首听命。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屡有“对扬王休”、“对扬天子皇休”一类的习惯用语，即以此表示诸侯和臣下对于周天子的尊崇，显示了周代王权较商代更为加强。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

② 《诗经·文王》。

如果要作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可以说分封制下的周代社会结构，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周王正踞于这座金字塔的顶端。为表示自己的尊严，周代有繁缛的礼仪，仅就服饰来说，周王也与一般的臣民远远不同。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可以说是他那称为冕旒的王冠。冕旒的形制是在圆管状的冠上加以覆版，称为“延”。在冠上，“延”要后高前低，略向前倾，表示居高临下。冠和延的外面呈黑色，里面是朱红色。“延”的前端垂有彩色丝线做成的组纓，穿挂着的彩色的玉珠，是谓旒。相传天子有十二旒，每旒挂十二个玉珠。这些流光溢彩的玉珠悬挂在“延”的前端，不仅极显豪华，而且亦是周王神秘与尊严的象征。

周代王权的强大直到西周后期，依然随处可见。周孝王死后，诸侯拥立懿王的太子玁继位为夷王。周夷王依靠诸侯的力量得以继位的事实，说明了诸侯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趋于增强。但是周夷王时期，周王室仍然有挟制诸侯的力量。周夷王曾经命令王朝卿士虢公率领六师军队讨伐戎人，获马千匹。这个时期的彝铭《虢季子白盘》记载，周夷王在位的第十二年曾经命令虢季子白讨伐玁狁，在洛河附近斩敌首五百，俘敌五十，大获全胜。号称“中兴之主”的周宣王，武功更是辉煌。彝铭《兮甲盘》记载，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宣王亲率大军讨伐玁狁，名兮甲的武将随从出征，因“折首执讯”而受到奖赏。周宣王还致力于经营南方，《诗经·采芣》篇记载周宣王时期的武将方叔曾经率领三千辆战车去讨伐“蛮荆”。这个时期的一件簋铭记载，周宣王曾经命令武将率领“左右虎臣政（征）淮夷”，不仅杀戮和俘获了许多敌人，而且“毆俘士女、羊牛，俘吉金”，战果相当可观。周宣王还曾命令召伯虎率军征伐江汉地区，征服了许多方国。当时人曾以这样的诗句来叙述其事：

江汉汤汤，	江汉的水势汤汤，
武夫洸洸。	武夫们勇猛顽强。
经营四方，	在四方克敌创业，
告成于王。	报告成功于周王。